

后殖民语境下《抵达之谜》中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高惠琳

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V. S. 奈保尔在《抵达之谜》揭示了身份认同危机的问题，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其对母国文化记忆的缺失及对帝国文化符号衰落的认识。其表现为奈保尔的身份认同始终处于一种在母国与宗主国文化冲突的两难抉择之中。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拉扯，使他的身份处于一种不断漂泊的状态。本文集中探讨了他在不同阶段中的文化记忆，以及这种文化记忆与其身份认同的关系，展现了移民个体在后殖民文化背景下寻找身份认同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奈保尔；抵达之谜；文化记忆；身份认同

在后殖民语境下，个体身份的追寻及其确认过程常常面临文化断裂和记忆流失的双重挑战。奈保尔出生在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作为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其作品《抵达之谜》中精细地描绘了身份与文化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反映了个体在持续的漂泊中追求身份认同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涉及记忆的选择性重构、象征性表达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反映了社会和文化在时间中的连续性和变迁。学者赵静蓉中指出：“文化记忆主要功能是为身份定位，通过保存和传承集体知识确证文化连续性，并构建文化身份，同时创造共享过去，增强社会成员的整体与历史意识。因此文化记忆是我们进入认同问题情境的一个极佳切入点。（赵静蓉，2015:3）”扬·阿斯曼认为“这里涉及文化记忆术，即如何储存、激活和传达意义。我们所指的文化记忆术的作用就在于保证连续性即身份认同。不难看出，身份认同归根结底涉及记忆和回忆（扬·阿斯曼，2015:87）。”

“从个体认同到集体认同，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这类过程动态地描摹了身份认同的嬗变机制。（陶家俊，2004:37）。 ”资本主义现代性改变了西方社会结构，推动外来民族加速融入现代化。因此，身份认同更多体现为文化主体在主导与非主导文化间的选择，伴随思想冲突与精神挑战，个体体验复杂的情感交织。本文以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记忆为视角，旨在探讨奈保尔的一部具有半自传性质的作品——《抵达之谜》中的“我”的身份认同是如何被民族文化记忆、帝国文本所影响，又是如何与自己和解，实现跨文化记忆的融合，将个人经历与广阔的文化

背景融合，踏上探索身份认同的艰难旅程的。”

（一）民族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迷失（第一层危机）

1988年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引入了“文化记忆”的理念，将记忆从个体心理学的框架中延伸到了文化维度，他认为文化记忆以仪式、文本、纪念物或者其他媒介物为象征“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群体确认自身的身份认同（扬·阿斯曼，2015:47）。 ”这指明了文化记忆在建构自我身份、群体身份、文化身份都发挥着重要的认同作用。作为移民的奈保尔一开始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所有到达英国之后才回忆起来的关于那座小岛便是“我遥远的故乡那座热带的岛屿”（奈保尔，2016: 3）^①。作者通过英国庄园丘陵上的小牛，联想到特立尼达上炼乳商标上的牛、种植地和甘蔗。故乡没有书店，远一点的西班牙港的商场像是殖民者的仓库“进口了必需品……摆放方式只讲实用、毫无美感。”（112）。他对特立尼达的广告和商业文化进行了描写，表达了一种难以与这些商业象征建立联系的感觉。这种疏远感不仅是物质符号层面的，也体现在他与周围人群的互动中。尽管他在特立尼达长大，但始终感觉自己是观察者，而非参与者。就算是对母国庄园的初始印象也指的是蔗糖庄园“是没有任何宏伟的风格和概念的，只有一种规模和单调的印象，以及庄园边上微不足道的生活和房子”（186）。因此所拥有的童年记忆来自于祖先的在特立尼达的建立的一种后殖民理论提出的“文化飞地（介绍）”上。他所体验的是一个由不同文化背景混合而成的社会，其中包括殖民历史的影响和多种族的共存。这种复

杂的社会结构使得他难以完全融入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始终保持一定的观察者和外来者的视角。

相较于生长地特立尼达，小说中提到对于母国印度的记忆更是少之又少，仅仅是提到了自己的祖父从农耕文明的印度带来的对于奶牛崇拜的传统。“我们处在古老雅利安人奶牛崇拜的晚期，崇拜给予奶的牛，若是没了牛奶，人们的生活会更艰苦，在某些气候和地形中甚至无法生存。这种崇拜是我们的祖父从农耕的印度带来的。我小时候，我们仍敬重这一观念，以及它和远古的联系。对我们而言，牛初乳几乎是神圣的。牛的主人用这种浓稠的牛奶制成糖果，分成小份送给亲友，就像宗教仪式上的供奉之物一样。（78）”由此可看出，主人公对印度血统的淡漠主要体现在他对印度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和情感投入上的缺失。奈保尔的祖先是作为契约劳工（也称为印度合同劳工或“indentured labourers”）从印度来到特立尼达的。尽管奈保尔是印度裔人，他自己却未曾在印度生活过，因此对印度的记忆仅仅是模糊且间接的，主要来源于书籍和他人的叙述，而非亲身体验。这种间接的、通过第二手资料获得的文化体验，使他难以真正感受到与印度人文化认同的深刻联系。

“民族认同及其稳固，持久性是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的”（扬·阿斯曼，2015：168）。民族文化记忆在塑造集体身份和个体自我认知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对印度血统的淡漠与对特立尼达成长环境的疏离。使得主人公尽管生于特立尼达，却因为记忆的缺失未能在其母国以及这片土地上找到归属感。以至于作者后来回忆时：

“我想看到覆灭的可能性、确定性，甚至在创造的时刻：这是我的性情。这些神经部分是我孩童时在特立尼达岛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住着半损毁或是衰败的房子，频繁地搬家，总之生活在不确定中。也许这种情绪有更深的来由，是祖先留传下来的，伴随着造就我的历史：不仅是有着“世界超出人的控制”思想的印度，还有殖民地种植园或是特立尼达岛的庄园，我贫困的印度祖先在上个世纪被运到那里——我如今住的威尔特郡庄园，是其中典范。（47）”

作者这种对覆灭和不确定性的深刻关注，恰恰源于其内

心深处对于身份稳定性的不安和疑虑，对特立尼达半毁房子的记忆使其从小就缺乏一种稳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以及对自己贫困祖先在印度的记忆也让他感受到了自己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他的心境与周围环境的隔阂，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一个“家”的向往和寻求，这种向往和寻求却因为文化根源的模糊而变得复杂和困难。这些都是作者身份认同迷失的表征，也是奈保尔身份认同的第一场危机。

（二）文化符号的再构与认同的探索（第二层危机）

文化记忆的传承一定是遵循着某种特定而严格的形式。从媒介上来说，文化记忆需要有固定的附着物、需要一套自己的符号系统或者演示方式，如文字、图片和仪式等。阿莱达在《回忆空间》中提到：文化记忆的载体依赖于可以传递的代代相传的文化客体、符号、人工制品和媒介社会化的仪式实践的。“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阿莱达·阿斯曼，2016:206）。扬·阿斯曼也提出文化记忆仪式和文本的内在一致性来建构群体的身份和结构，“事实上，记忆在这里起到了文字的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字作为媒介的功能，而是它跨越空间的距离把从前所说的话固定为文本，重要的是它的文本性(Textualität)（扬·阿斯曼，2015:307）。”他从地中海古代文明入手，通过分析古埃及、古代以色列和古希腊的例子，揭示了文化记忆的运作机制，尤其是文字作为媒介的作用。“记忆不是对以往事实的简单的储存，而是对这些事实富有想象力的重构，每个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他先前获得的知识带入眼前的文本之中，这个已有的知识相当于背景知识”（Domansky & Welzer, 1999转引自金寿福，2017：36–40）。正因为帝国主人公所收到的帝国精英教育是他记住了许多带有浓厚帝国主义色彩的帝国文本。这些文本、文字对塑造作者前期的帝国想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主人公看到稻草由此想到书中描绘的欧洲人睡在谷仓里的稻草人情形、通过哈代或者维多利亚时代的乡间日记回忆书里描绘的剪羊毛过程、认为杰克的父亲像是华兹华斯笔下的人物、看到奶牛想到格雷《墓畔挽歌》中的“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哞声起落”和哥德史密斯《荒村》中的“清新的牛群在晚间呼唤着牛犊”的美好景象等，都可以看出主人公的英国形象大部分来源于他早

年阅读的书籍，这些书籍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帝国。这种通过文本传递的文化记忆使他对英国抱有非常高的期望。然而，当主人公满怀希冀来到梦想中大城市，亲自经历英国生活时，他发现现实与他从文本中构建的帝国形象大相径庭。一方面在文中“狄更斯模仿儿童的视角大约给了我一些幻觉，让我误以为我完全了解这座城市，并期待写作生涯在那里得以发展。”这体现出他对人文环境和英国建筑的实际感受与早年从文本中获取的理想化印象存在巨大差异。作者坦言“来到伦敦，本以为对它很熟悉，却发现了一座陌生而为之的城市——房子的风格，甚至区域名都陌生”。奈保尔为了深造作家之路来到这里，当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伯爵府大楼里的流亡者时候，他无法像其他伟大作家一样——他找不到素材。回过头来，作者借助文学之眼看到这一切也始终带着“异乡人的紧张”（15）。“在那座遥远的小岛上，多年来一直梦想着来到英国但是我在英国的生活索然无味，没有意义”。（95）另一方面，来到伦敦的作者不断将此时的英国与彼时的大英帝国所对比。他感受到帝国的辉煌已成为过去，发现自己真正怀念的是另一个时代的完美——一个更早的时代，就像在特立尼达时眺望伦敦一样：

“于是，我准备想象我此刻身处的伦敦并不是我所追求的那个完美世界。我孩提时在特立尼达，把这个世界放在远方，也许就放在伦敦。如今在伦敦，我能够把这个完美的世界置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更早的时代。这种精神或情感上的转变过程是一样的。（125）”

那个更早的时代正式作者意识到自己和杰克甚至和他自己以及其他庄园工人一样，都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并不是本地居民而产生的失落感。这表明，即便在后殖民时代移民潮涌现之前，英国已经存在一种文化混合。例如：曾经以为是庄园里的老人、英国大宅子中的仆人或雇工的代表的菲利普斯夫妇“比我早来庄园也就不到一年”（210）以及杰克也“有可能是后来才来山谷的”（13）。在庄园里作者对于杰克的认识也经历了从“过去的残余”（13）到“农舍周围的过去也许并不是他的过去”（13）的转变，此外，作者原本想象中作为旧帝国时代遗产的威尔特郡乡村是英国历史的留下来的奇迹，是脱泥于城市

化和工业化进程之外的，最终也“只剩下宅子和园子、失去了农场和土地”（85）。这种庄园里的人的混合、和庄园本身从辉煌的符号象征到只不过是工业化的抛弃的地方，这些都表明了所谓的英国身份的纯粹性和优越性（曾魁，2021:116），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

文化记忆的转化，往往伴随着记忆的割裂和重新配置，也伴随着记忆的加深和拓展。这种转化只有在符号媒介的帮助下或者赋予记忆以持久的支撑物，才是可能实现的。书写文本固定了记忆，使之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作为传承符号的文本不仅仅是过去的简单记录，而是在社会中被有意识地建构、传播和维护的过程。文学作品作为永生的符号媒介，支撑着主人公对帝国的美好想象，但当这些理想化、特意被主人公保护着的记忆与现实相遇时，庄园的衰落，人文的混杂是的作者对帝国的文化记忆产生了割裂与重构，美好想象不仅没有得到验证，反而带来了心理上的落差和文化上的失落，进而强化了他作为“他者”的身份。对英国过去辉煌时代的怀念和对“永恒的英国”的祛魅，揭露了英国传奇地位的建构性，即英国性是通过幻想某种永恒不变的过去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怀旧与失落感使他认识到他在这里不被接纳达——“我所肩负的历史，以及教育和抱负带来的自我意识，把我送到荣耀已逝的世界。英国给了我最刻骨铭心的异乡人的紧张”（48）。这种不适的紧张感和失落构成了奈保尔的第二场身份危机。

（三）跨文化融合之下：杂糅的文化记忆与流散的移民身份认同

在《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中，学者赵静蓉通过记忆的角度切入文化“个体通过私人化及社会化的行为来认知自我，并介入到集体生活和集体记忆中，通过创造一个想象的、共享的过去来确证和重构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及社会成员的文化身份（赵静蓉，2015:240）。如前所述因为奈保尔的文化记忆不断处于断裂与重构之中，这种往返使得他的文化记忆兼具多种文化的渗透，而决定了其身份认同必定也是复杂而多元的。“记忆是明显的带有身份指向的知识（Aleida Assmann et al, 2010:123）”，那么杂糅的文化记忆就导致了身份认同的杂糅。奈保尔身份认同是动态发展的，随着对自我和文化的持续探索而不断变化。

在小说中，他描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对英国充满期待的旅者转变为对其文化和社会深感失望的批评者——“但是作为起点与中心的特立尼达自身无法再留住我”（148）。这也揭示了流散裔知识分子在寻求身份认同时，必须面对的文化断裂和心理迁徙的挑战。作者一方面对于宗主国或是所移民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优越物质生活产生了无法割舍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又对遥远且原始出生地产生了之前身处其中不自知的强烈思念，从而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形成了现实需求与精神原乡之间的双重矛盾。遭遇了文化断裂与心理上的落差的奈保尔，在一次次英国与特立尼达往返旅行之时，逐渐对自己过去的进行反思并开始理解和接受自己的这种身份的流动性和无根性。他意识到自己的根并不固定于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中重新塑造。这种对过去的深入思考帮助他认识到，身份并非静态和单一的，而是多元和动态发展的。

在书中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能够探索到主人公心理转变的过程。首先，主人公在英国的经历使他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国家文化上的距离。他描述了在一个冬天的季节感到的孤独和与环境的隔离“我来英国后数年来意识不到冬天的存在，从来不觉得需要穿戴外套，手套，甚至套头衫，现在的我觉得体内冰冷，肺部寒凉”（315）以及“但是如今，哲学于我已派不上用场。土地不再只是土地本身，它吸呼着我们的呼吸，也受我们的心情和回忆感染。我生命中这个轮回的终结，庄园生命中这个轮回的终结，与疾病导致的衰老感混在一起，令我悲伤。”（317）这些都反映了他对自己身份中“无根”的部分逐渐地接受。尤其在他的居住地周围，那些他先前没怎么留意过的旧房子，在雪地中显得格外突出，这增强了他对自身与周围环境之间所体会到一种孤立感。随着皮通、艾伦、菲利普斯先生的离开，庄园的时代逐渐接入尾声，维护庄园的工作失去了珍贵的人，变得不再有秩序，作者不久后也要搬离这个地方，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的山谷的土地不属于也不会属于“我”，“我”即将也要开启新一轮的抵达。其次，主人公回忆起自己的故乡特立尼达，对那里的文化和生活有着深刻的回忆，但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在文化上与故乡断

裂“我感觉时间在变。最初来到这里，时间是如童年时期那样被拉长的……我期待季节更迭，新的一年到来。接着记忆开始混杂，时光开始飞驰，岁月开始交叠，使我难以分辨回忆中的时间”（283）。这种记忆混杂和重合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更加迷茫的“无根性”。但在文章最后，通过写作和创作，主人公探索和表达了自己的身份感受。写作成为他处理和理解自身经历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手段。那幅《抵达之谜》的画、那些旅行者的故事、陌生的城市、精疲力竭的生活也被作者内化为自己私人的小说中，成为关于作家徘徊的旅程的故事。“故事因此变得更为私人。我的旅程，作家的旅程，被写作中的发现与看待事物的方式所限定的作家，而非个人的经历所限定的作家，旅程初始彼此分离的作家和人，在第二段生活结束前一合而为一”（325）。这是一种对身份认同流动性的认同和接纳。在这里，奈保尔认为，虽然作家的职业身份和个人生活起初可能看似分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这两者最终融合，形成一个更为完整和丰富的自我认知。这不仅是一个作家以书写自传的形式将自己与个人生活的融合，更是一个文化和身份的综合体现。他认识到，无论是作为移民还是作家，个体的身份是可以转变和发展的。通过自己的写作和生活经验，他表达了一种对传统固定身份认同的挑战，以及一种更为开放和流动的身份理解，接受了自己身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寻找自我的旅程。作家的身份因而不完全受个人经历的束缚，而是更广泛地由其通过写作所探索和表达的视角定义。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身份界定的方式，使作者能够无根中重新定义自己。

结语：“抵达”是一种无根的状态

成为“我”是一项永不停止的身份规划和记忆工程，也将永远地处在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赵静蓉，2015:273）。十八岁怀着挤入大都市的梦想来到英国，却在这几十年间一直漂泊，这座帝国遗留下来的庄园——曾经以为可以是旅人可以栖息的地方，却在作者倾尽自己开放内心的时候，悄无声息又无法忽视的改变了，正如作者所说的刚刚意识到自己第二次生命环境的好处，它就变了。那些对丘陵与河流的记忆、白垩与苔藓玫瑰的

记忆，也会随着一个又一个人的离去而消散。即使是魁梧的白杨树也会有被狂风折断的一天。在这座帝国庄园的变迁中，奈保尔经历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他既无法完全回归以母国文化为基础的传统，也难以全面接受或拒绝象征现代文明的西方主导文化。这种文化之间的拉扯使他的身份认同始终处于漂泊状态。最后作者通过写作找到慰藉，在意识到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时，奈保尔才开始寻找内心的归宿，学会以一种更加融合的心态在不断的旅途中寻找生长的可能，“于是过去之于我——作为殖民地的人和作家——充满了羞耻和屈辱。不过身为作家，我能训练自己面对他们。的确，他们成了我的主题。（232）”作者通过写作明白了保持一种更加融合的心态在旅途中野蛮生长才是最重要的。也许抵达本就是一种环状的旅行，在路上的人总会不时地回到起点。

注释：

①凡引自奈保尔《抵达之谜》中的内容，均出自：奈保尔. 抵达之谜 [M]，蔡安洁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下文引用仅标注页码，不另做注。

参考文献：

[1] [德]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206.

[2] [德]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M]. 金寿福, 杨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7、87、168、307.

[3] Aleida Assmann and Sebastian Conrad eds., Memory in a Global Age: Discourse, 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123.

[4] Domansky, Elisabeth & Harald Welzer. 1999. Eine offene Geschichte: Zur kommunikativen Tradier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ergangenheit [M]. Tübingen: Edition Diskord. 转引自金寿福.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J]. 外国语文, 2017, 33(02): 36-40.

[5] 曾魁. 拷问遗产话语与怀旧——《抵达之谜》的后殖民视野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1, 42(03): 116-123.

[6] 奈保尔. 抵达之谜 [M], 蔡安洁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6: 3、13、15、78、95、148、210、232、315、317

[7] 陶家俊. 身份认同导论 [J]. 外国文学, 2004, (02): 37-44.

[8] 学者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3、240、273

[9] 周敏. 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加勒比身份叙事——以《抵达之谜》为中心 [J]. 外国文学, 2023, (03): 55-65.